

传播事业作出贡献的华籍美人



□ 任东升

身”。心潮澎湃之余，沙博理决心要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旁观者、见证者转变为参与者、贡献者，投入新中国的翻译和对外传播事业之中，最终以千万字的译作成就了独属于自己的美名：翻译英雄（Hero of Translation）！

从个人事到国家事

1950年，沙博理受聘于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任英文翻译。1951年10月《中国文学》英文版创刊之际，他与叶君健、杨宪益、戴乃迭共事，英译中文稿件并承担英文审稿。1952年，他翻译的第一部中国文学作品《新儿女英雄传》在美国纽约出版，这部反映共产党领导冀中白洋淀地区农民不畏强暴、奋起战斗的长篇小说英译本 *Daughters and Sons* 成为在美国出版的新中国第一部“红色”作品。

1963年，沙博理正式加入中国籍。在5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共翻译了约1000万字的中国作品，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集中表现党领导的解放战争的作品，如《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第二类是揭露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资本家以及地主高利贷者重重压榨农民罪恶行径的作品，如《春蚕》；第三类是展现新中国发展、讴歌劳动人民的作品，如《创业史》《欧阳海之歌》。此外，沙博理翻译的古典长篇小说《水浒传》被收录于《大中华文库》。

受聘于国家部门专事汉英翻译和对外传播，一干就是50年之久，沙博理已经把翻译当作国家事业而为之兢兢业业。沙博理翻译的《红岩》《创业史》《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等作品，以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为主题，以战士、农民、工人为主角，反映了人民的斗争生活和精神面貌，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和历史价值，是国家叙事的重要载体。翻译这些红色作品是新中国实施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国家行为，而沙博理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沙博理几乎把毕生精力都献给新中国的翻译和对外传播事业，始终关心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国家的幸福，这是他在被中国共产党感召和认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作出的政治选择。

从传播者到代言人

1983年退休后，沙博理时常关心国家大政方针，情系人民生活，不顾高龄和舟车劳顿多次随政协代表团外出考察，了解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气象。

实际上，早在1957年夏天，沙博理就自费去了一趟革命圣地延安。在那里他主动了解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历史、抗战历史、解放战争历史，还参观了毛主席故居。他写道：“毛泽东在这里撰写了很多思想深刻、决定中国命运、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文章。”听到见过毛泽东的老人说“毛主席总是平易近人，和老百姓打成一片，他拒绝接受任何特殊待遇，一边领导革命事业、撰写鸿篇大论，一边打理自己的菜地，穿的都是旧衣服”时，沙博理更是由衷地敬佩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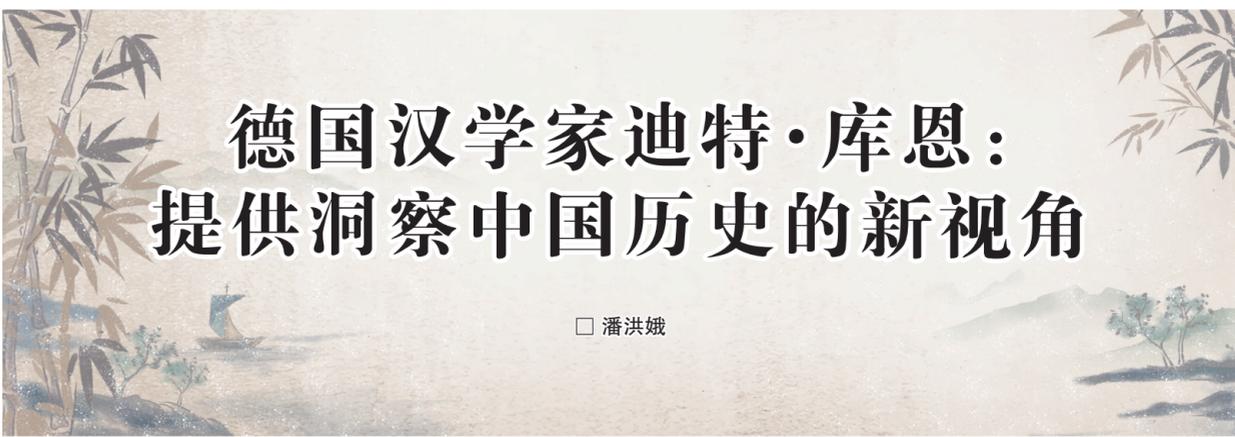
步入晚年的沙博理依然笔耕不辍。他时刻不忘自己是学法律出身，编辑出版了英文版《中国古代刑法与案例选编》。出于对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思想的极大兴趣，他还编辑出版了英文版《中国文学集腋：从明代到毛泽东时代》。在参加上述学术专著的国际研讨会时，他意识到“西方发布的关于中国的许多消息都是错误的，有的是出于无知，有的是出于恶意。一直以来，他们总想用他们的文化、标准和他们对中国的先入之见判断中国的事情”。因此他多次在国际会议、电视节目、广播访谈中对错误观点予以驳斥，结合自身经历向西方民众讲述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沙博理对传播中国文化的事业高度关注，以极负责的态度履行全国政协委员职责，提出许多具有现实价值和历史意义的提案。2010年，沙博理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在《人民日报》发表《让中国文化走出去》一文，提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三条建议：一是由外文出版社组织一个由本社专家和其他历史文化专家学者组成的委员会，专门审核我们已经翻译出版的文学书籍和期刊。二是选取一些优秀作品，重新编辑，使其更好地适应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的阅读习惯。三是加强这些图书和期刊在英语国家的出版和发行，在公共推广和广告宣传上提供支持。

在沙博理长篇英文自传《我的中国》中，我们能强烈感悟到他对新中国的一片赤子之心。在与中国人民共同经历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多次战争痛苦，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喜悦之后，沙博理与中国共产党结下了深厚友谊，对新中国充满了热爱和感情，热切希望“让外国人知道当时中国的政治情况、中国人的感情和中国的历史”，沙博理已然从中国文化的传播者转变为代言人。

德国汉学家迪特·库恩：提供洞察中国历史的新视角

□ 潘洪娥



迪特·库恩（Dieter Kuhn），德国著名汉学家，先后在英国剑桥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研究所和柏林大学工作与任教，现任维尔茨堡大学汉学系教授，主要研究中国文化的起源、考古学等领域，尤为擅长物质文化史与科技史、宋史研究。库恩通过其“异域之眼”，考察更宏大全球史背景下别样的中国史，给我们提供了洞察中国历史的新视角。

因关注中国古代织机结缘汉学。库恩出生于1946年，在大学生期间先学习了商科、纺织企业经营管理学。中国古代纺织技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领跑世界的，中国人民创造的竹笼机、多锭大纺车等都可代表当时世界纺织生产的最高水平，这也是库恩较早关注中国纺织技术的原因之所在，他发表了关于中国古代织机的多部论著。1975年库恩在其第一部著作《中国手织机的描述——对19世纪以前中国农业文化中的织布机的研究》中描述到，“古之人曰——夫不耕或受之饥，女不织或受之寒”，描绘了中国古代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美丽图景。正是缘于这种感染，库恩开始对中国织机的必备工具——织机产生兴趣，并在科隆大学和波恩大学学习东亚艺术和汉学，走上汉学尤其是中国史的研究道路。

1977年库恩完成的博士毕业论文，聚焦的主题即是世界上关于织机及其结构最早的记载《梓人遗制》。《梓人遗制》是金末元初木工理论家薛景石对其一生木工机械设计和制造工艺的总结，对纺织机具体结构的介绍比同时期及以后的《农书》《农桑辑要》《天工开物》

《农政全书》等书的相关记载都要详尽具体得多。20世纪70年代后期，库恩受邀到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研究所，从事中国纺织技术史的研究工作。1988年，库恩编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九册）、《纺织技术：纺纱和缫丝》出版，全面介绍了中国纺织品及纺织技术的发展历史，论述了麻纺和缫丝技术在中国历史上的演变，揭示了中国纺织技术创新对世界其他地区和中世纪欧洲纺织品生产的影响。

重视中国古代墓葬文化研究。库恩研究古代中国不是以理论架空历史事实，而是擅长以实物文化证实改变的社会环境，包括丝绸之路留下的文化遗产、古代王朝贵族的墓葬文化等考古发现。库恩认为中国的墓葬文化是杰出的、独一无二的文化瑰宝，而宋朝时期中国的墓葬文化又是继周朝、汉朝、唐朝以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顶峰。

1985年开始从事中国宋朝墓葬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1990年至1993年，库恩参与由德国研究协会资助的辽宋金时期上层墓葬的社会考古学研究项目，完成了两篇学术报告《死后仍与生前一样——中国古代上层社会的墓穴》《优于文字记载——研究宋朝历史的一个社会考古学方法》。前者旨在证明，“中国的墓穴的建筑方式以及内部、外部的设施”，其发展变化过程的延续性“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后者旨在告诉人们考古学在研究中国断代史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墓葬研究对于阐释中国社会在公元900年到公元1300年期间发展的重要性。

1994年完成、1996年出版的《一个给死者呆的地方——宋朝墓葬

考古学的记录》，对“学者、官员的墓穴种类”“家庭式墓地”等进行了具体而准确的研究，给历史学家们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宋代墓葬考古研究资料。世界著名考古学大师、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张光直教授为此书作序时指出，“迪特·库恩的这部著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学术界尤其是为研究宋朝的历史学家提供了全面而翔实的新资料，而这些新资料便是考古研究发掘出的宋朝的墓葬文化。”

重新审视宋代中国社会变迁与宋史地位。宋史是库恩中国史研究的重点领域。其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宋代文化史》，被誉为“欧洲第一部系统的宋代断代史著作”，从宋代的社会结构、农业经济、文化生活、技术成果以及丰富的消费品等各个角度详细介绍了宋代，并且试图阐述在宋代产生的新的社会体制与农业文化、城市文化以及物质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其专著《宋王朝——从其文化看一个新社会的形成》，研究了宋代中国社会的变迁，试图用实物文化来证实这些改变了的社会环境。在此基础上另一部著作《地位和礼仪——从远古到公元十世纪贵族的中国》，通过“地位和礼仪”这两个具有高度概括能力的概念，审视宋代中国的社会变迁。

反映库恩长期从事中国科技史、艺术史和宋史鲜明烙印的研究成果是《哈佛中国史》丛书的第四卷——《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哈佛中国史》是2016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是继《剑桥中国史》之后最能代表西方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史研究全新成果和水

准的多卷本中国通史。与长期以来对宋代历史地位评价较低的研究不同，库恩从全球史的崭新视角，以地理为经，文化为纬，聚焦于“儒家治国、改革、军事弱势”三个关键词，搭建起高度评价宋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叙述模式。从军事威力、战略创新和势力范围来衡量，宋朝无疑是个虚弱的朝代。但就繁荣程度而言，宋朝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人文精神、最有教养、最有思想的朝代之一”。库恩认为，儒家文化是宋朝的最重要的特点，在宋朝统治的300多年里，儒家意识形态在公共和私人领域形成一股强大力量，宋朝士大夫创造的思想范式，以及儒家价值观的复兴和重建，为后世历朝历代的教育、政府制度和市民社会的发展建立了基础。这些在政治、意识形态、文化、文学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给我们展现了一个转型时代各项改革制度、思想转变的场景。

总的来看，库恩的中国史研究力求寻找中国历史变迁中的社会因素，试图指出和证明，“在所有的文化中，中国文化具有最持久的延续性……中国文化具有某种内在的强力和变迁的能力”。库恩给我们建构了洞察古代中国尤其是宋代历史的异域坐标，其“中国观”为中国本土学者和读者认识中国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堵”与“疏”

□ 刘文强

中国古代的水利工程较多，如芍陂、郑国渠、漳河渠、灵渠等。其中，较为完美诠释“堵”与“疏”的两种治水理念的则是两个水利工程：一个是近些年考古发现的建造于距今5000年左右的良渚水利工程，另一个是公元前256年修建而成的都江堰。

据最新的考古发现，良渚水利工程其实是一个高、中、低三级水坝系统，通过人工垒筑的高低错落的土坝群，阻水于山间及平原的地势低矮处，起到阻挡洪峰等作用。其中，岗岭等山谷谷口水坝群组成高坝系统，坝顶海拔25—35米，坝体宽60—80米。大遮山脉和塘山间新发现的多条长垄为中坝系统。鲤鱼山水坝群等组成低坝系统，坝顶海拔9—10米，坝体宽50—100米。当山洪和暴雨来临时，高坝系统可首先阻水于山谷中，中坝系统可应对洪峰外溢的二次冲击，低坝系统最终阻挡漫溢洪水于低地，并将多余水量定向排出。这种高、中、低三级坝体的配合，不仅可以有效地应对暴雨和山洪，三级坝体形成的水面也能起到很好的水上运输等作用。

都江堰是战国时期秦国郡守李冰率众修建的古代大型水利工程，以无坝引水闻名世界。其工程主体实际上是一个疏导和分流系统，主要是通过打通玉垒山宝瓶口以及筑造分水堤起到分流和引水的作用，实现了江水流向以及流量上的控制，进而起到集分洪、引水灌溉和航运等于一身的作用。现工程主体为鱼嘴分水堤、宝瓶口和飞沙堰。《华阳国志》《水经注》等典籍中记载的“壅作册”即是在江中筑分

水堤，主要起到将岷江水流方向内外二江的作用。宝瓶口位于玉垒山脚，由开凿玉垒山而形成，是内江进水的咽喉。飞沙堰是位于分水堤下段和宝瓶口之间的一段低堰，主要起到泄洪和排沙的作用。

这两个水利工程突出体现了一“堵”一“疏”的建造理念。良渚水利工程的各处堤坝体现了先民对“堵”的执着，都江堰的分水引水很好地诠释了“疏”的偏好。客观而言，这两个水利工程的理念侧重不同，更多的是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而形成。一个地方的地理环境状况对于该地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而这两个水利工程修建最重要的出发点之一，便是因地制宜改善原区域不适宜文明发展的原有自然及水文地理环境。

良渚水利工程所在的天目山系是浙江省最大的暴雨中心，夏季极易形成山洪。山洪的肆虐一方面直接威胁着地处下游平原的良渚先民的人身安全，另一方面对农作物也有着毁灭性的破坏。因此，对当地这一极易引发山洪的自然地理环境的改变便显得尤为重要。成都平原在都江堰修建之前有着水患与干旱两方面的自然环境问题。以岷江河道为界，以西外江区域在多雨季节经常受到洪涝灾害等水患威胁，时常冲毁农田及民居，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而岷江以东区域又经常连年干旱，农作物灌溉用水及民众生活用水均较为缺乏，对农业及民众生活有着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对岷江河道进行引水分流也便极为迫切。

良渚水利工程利用天目山系南麓的天然谷地，在谷口狭窄位置筑

以堤坝，巧妙地形成了高、中、低三个容水库区，直接便可以拦截多雨季节的暴雨，避免了夏季暴雨对于下游古城区域的直接冲击。都江堰则是在岷江流出山地进入平原的出口处，用火烧冷水浇的自然方法开凿了异常坚固的玉垒山山体，形成了可供分流引水的宝瓶口，而后又在宝瓶口上游的岷江河道内，用与修筑良渚水坝相通的方式构筑金刚堤以改变水的流向，使更多的合适的水量进入宝瓶口。都江堰的修建重新分配了原岷江河道东西两侧的水量，使得原来容易发生洪涝灾害的西岸不再易涝，亦使得原来较为干旱的东岸得到了有效灌溉。

从表面来看，良渚水利工程和都江堰似乎是截然相反的设计理念和建造理念。良渚水利工程相较于而言更类似于文献记载中鲧惯用的“堵”的做法，都江堰和鲧之子大禹常用的“疏”的治水方法颇为相合。然而换个角度进行考量，这两个水利工程的建造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又是相通的。

良渚水利工程利用多个坝体形成了高、中、低三个容水库区，可以阻挡洪涝于其库区之中，以达到防洪和航运等目的。其做法初看是堵，然则两个库区的容量毕竟有限，不可能永远只进水而不出水，因此，低坝库区必然会有专门的泄洪口或泄洪槽。因而，良渚水利工程系统不可能仅仅是“堵”，它的堵从另一方面看也是有目的有方向的“疏”。

都江堰水利工程以因势利导、无坝引水而闻名。如今二王庙的墙壁之上还有着“深淘滩、低作堰”的古法水则，将治水方法中的一个

“疏”字体得淋漓尽致。然而，其竹笼中装石砌筑而成的位于岷江中心的分水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堵”——堵水之外江去路以引之内江，当然这种“堵”也是为了更好的、有目的的“疏”。

从良渚水利工程三个坝区的蓄水库容来看，其若是发生溃坝事件，那对于良渚古国的人群来说将是致命的，而良渚人群在大湖流域能一直持续到距今4300年左右，至少说明在这约700年的时间内，良渚水利工程的运行是安全稳定的，也说明其约700年间一直在发挥作用。都江堰则是通过历代不断地修缮与维护，持续两千余年不停地造福着四川盆地的人民。

良渚水利工程系统和都江堰因为自然环境及治水目的的差异，从而在建造理念侧重方面有着不同的体现。然而从深层次考虑，良渚水利工程的“以堵控疏”及都江堰的“为疏而堵”在实质上是相通的，都是根据因地制宜而践行的治水理念。而通过中国早期这两个水利工程所体现的“堵”与“疏”也可以看出，无论是鲧的“堵”还是禹的“疏”，从治水方法上来说其实也并无孰优孰劣。无论是侧重于“堵”还是侧重于“疏”，只要前期妥善建造，后期合理维护，均能持续数百年而不溃。

